

東方

文化集成

李羨林主編

古代東方
文化編



赫梯条约研究

李政 著

昆仑出版社



东方文化集成

古代东方文化编

赫梯条约研究

李政^{||}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梯条约研究/李政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东方文化集成·古代东方文化编)

ISBN 7-80040-821-3

I. 赫… II. 李… III. 条约—研究—赫梯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437 号

《东方文化集成》

古代东方文化编

赫梯条约研究

李 政 著

责任编辑:张良村

责任编辑:马 涛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66531659

<http://www.jfjwypb.com>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821-3/I·608

定 价:5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中华文化编

日本文化编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东南亚文化编

南亚文化编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中亚文化编

古代东方文化编

ISBN 7-80040-821-3



9 787800 408212 >

李 政,1964 年生于甘肃兰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

1986 年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6 年—1993 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攻读历史学世界上古中古史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林志纯教授(日知先生),并于 1989 年和 1993 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 年—1993 年,获得欧洲经济共同体奖学金,赴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印欧比较语言学和赫梯语研究所联合培养攻读博士学位。1993 年至今,先后任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1995 年晋升为副教授。2005 年晋升为教授。1996—1997 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古代东方学研究所校际交流访问学者,2000—2001 年,哈佛燕京学者,在哈佛大学语言学系和近东语言文明系访问学习。

任职以来,先后独立承担了教育部、北京大学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部有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赫梯文明与外来文化》和《古代东方》两部著作,先后在《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东方研究》、《世界历史》、《中国翻译》、《国外文学》、《中外法学》、和《北大史学》以及 JAC 等中外文学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和书评,在《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和《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发表了论文。参加了《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世界古代史》和《东方语言文字与文化》等书籍的编写工作。

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主要有研究生课程赫梯语语法、初级赫梯文献阅读和高级赫梯文献阅读、赫梯历史与文化、赫梯学专题、赫梯条约与书信、赫梯法典与训文、赫梯语和象形文字鲁维语、古代安那托里亚印欧语言文化研究和专业德语。本科生的课程是古代近东文明和古代印欧文化。

Biography

Dr. LiZheng, Pr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tween 1986 and 1993, M. A Degree and PhD. in IHAC,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and Ruhr - Universität Bochum, Germany, PhD. Dissertation entitled Hittite Treaty. 1996 - 1997, Visiting Scholar of Orientalisches Seminar in Free University Berlin and 2000 - 2001, Harvard-Yenching Scholar, Research work in Linguistic Department and Dep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Two monographs have been published: *Hittite Civilizations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Ancient Orient*, and several academic articles and reviews about Hittite History and Treat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lasses taught are Hittite, Hittite History and Culture, Seminar on Hittitology, Hittite Treaty and Letters, Hittite Laws and Instructions, Hattian and Hieroglyphic Luwian, History and Culture of Indo-European in ancient Anatolia, and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

赫梯条约是公元前约 1500—前约 1200 年间小亚半岛强国赫梯国王与古代近东地区其他诸如埃及法老等大小国家统治者和赫梯国王的封侯们之间签订的条约。《赫梯条约研究》一书对赫梯条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介绍赫梯人条约的名称和赫梯条约的学术研究,赫梯条约文献的断代和赫梯条约的历史以及翻译赫梯条约文献入手,深入分析和探讨了赫梯条约的类型、它们的基本结构和历时变化、赫梯条约的史学和法的思想价值、赫梯条约与赫梯国王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以及赫梯封侯条约与赫梯国王的封侯政治。

作者认为,赫梯条约的术语不是不可以反思。赫梯条约完全可以划分出第三种类型,即封侯条约。赫梯条约结构的变化并不完全是随意的,有其主观的一面,这是赫梯国王针对不同签约人而做出的一个调整。我们认为,赫梯条约文献是研究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重要文献,不同类型和同一类型的赫梯条约都体现出赫梯国王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具有多样和灵活复杂多变的特点。赫梯国王的封侯条约在公元前两千年间的古代近东世界可谓是独树一帜,赫梯国王所建立起来的封侯政治体系与条约的结合开创了赫梯国王政治统治的一个时代。此外,作者认为,赫梯条约除了具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也体现出较高的法的思想价值。总之,《赫梯条约研究》一书不单是关于条约文献的研究,也是对于赫梯历史和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古代近东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古代条约史乃至古代外交史等领域的研究。

Abstract

It was known that treaties were adopted widely by Hittite kings and were us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Hittites. As we know, the Hittites not only had the famous "Silver Treaty" between Hittite king and Egyptian King, but also created a new type of treaty and possibly possessed the most treaty texts in number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in ancient near east.

This book is to investigate all preserved treaty texts of the Hittite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It included those treaty texts of the Hittites, written in both Hittite and Akkadian. The term and the date of each Hittite treaty texts were reconsidered. Besides Hittite parity and vassal treaty texts, a third type of Hittite treaties is proposed, namely Appanage treaty which is concluded between Hittite kings and their sons or royal member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its variations of Hittite treaty texts were analyzed and a diachronic analysis was provided, specially the reasons of the changes of structure were discussed. The author also pursued the historical and law value of Hittite treaty texts. Interested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Hittite kings toward their parity rulers and their vassals on the basis of Hittite treaties, the author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ttite kings and their appanage kings and the policies toward them. Appanage politics was possibly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ttite politics. A complicated aspects of Hittite treaties also reflected the complex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Hittite kings. At last, it presented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ll Hittite treaty texts.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羡林

名誉总顾问 谢慧如 泰国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名 誉 顾 问

纳吉布·迈哈福兹 埃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柳存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杜德桥 英国牛津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 教授

韩素音 英籍著名华人女作家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马思特大学 教授

谢和耐 法国法兰西学院 院士 法国著名汉学家 教授

马汉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郑子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夏希迪 伊朗德黑兰大学 教授 伊朗德黑兰大学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

谭 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原汉语系主任 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平山郁夫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教授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中村元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比较思想学会名誉会长

梁披云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 福州华侨大学董事长

捷达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金俊彬 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亨根 韩国东国大学佛学研究院院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特别顾问 韩天石 张学书 麻子英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马 曜(白族) 邓广铭 任继愈 朱维之

汤一介 纳 忠(回族) 启 功(满族) 林志纯 周一良

张广达 张岱年 张岂之 侯仁之 钟敬文

清格尔泰(蒙族) 袁行霈

《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陈嘉厚 叶奕良 张殿英 王邦维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委会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主 编 季羨林 **编委** 陈嘉厚 孟昭毅

《中华文化编》

主 编 吴同瑞 刘桓 王守常 **编委** 王邦维

《日本文化编》

主 编 叶渭渠 **编委** 潘金生 王家骅 卞崇道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主编 陶炳蔚 编委 金柄珉 金景一 史习成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主编 梁立基 编委 梁英明 梁志明 李谋 裴晓睿

《南亚文化编》

主编 黄宝生 编委 王邦维 王镛 刘曙雄 葛维钧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编 卞奕良 编委 张鸿年 张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编 郭应德 赵国忠 编委 杨灏城 孙承熙

《中亚文化编》

主编 赵常庆 编委 余太山 王小甫

《古代东方文化编》

主编 林志纯 编委 拱玉书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张殿英 副主任 卢蔚秋 张玉安 马克承 张光璘

编辑 李 强 姚秉彦 唐孟生 傅增有

昆仑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魏继光 副主任 董保存 编辑 张良村
施 雷 郭米克

《东方文化集成》书籍设计 朱 虹

丛书编辑出版监制 张良村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 羨 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声，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



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惟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 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 页）

姜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塞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



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 99% 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惟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 1471 年和 1474 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惟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 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 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



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傲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



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勒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惟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勒而起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